

第 一 章

导 论

第一节 世界范围的国有经济改革

国有经济改革，可以说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全球范围的一件大事。从东方的计划经济国家到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到北方的发达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范围内进行着。英国从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已将 50 余家大型国有骨干集团公司通过各种形式实现了非国有化，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原来的近 15% 下降到不到 5%。法国从 1986 年到 1988 年，已将近千家国营企业实行了非国有化。整个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占 GDP 的比重从 80 年代初的 9% 降到了 7% 以下。在 80 年代，70 余个发展中国家将 9000 多家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非国有化。在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在国民收入中占 80% 以上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已实现非国有化的国有企业已达国营企业总数的 $1/3 \sim 2/3$ ，据欧洲复兴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的统计，至 1994 年为止，私有部门的产值已在东欧及前苏联各国占相当比重。（参阅表

1.1.1)^① 它与本世纪 50~80 年代国有经济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者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的两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表 1.1.1 东欧及前苏联地区各国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

国 别	私有部门产值 占 GDP 的比重, 1994	国 别	私有部门产值 占 GDP 的比重, 1994
阿尔巴尼亚	50	立陶宛	50
亚美尼亚	40	马其顿共和国	35
阿塞拜疆	20	摩尔多瓦	20
白俄罗斯	15	波兰	55
保加利亚	40	罗马尼亚	35
克罗地亚	40	俄罗斯	50
捷克共和国	65	斯洛伐克共和国	55
爱沙尼亚	55	斯洛文尼亚	30
格鲁吉亚	20	塔吉克斯坦	15
匈牙利	55	土库曼斯坦	15
哈萨克斯坦	20	乌克兰	30
吉尔吉斯斯坦	30	乌兹别克斯坦	20
拉脱维亚	55		

资料来源: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转引自: Masahiko Aoki and Hyung-ki K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1995, P. 21.

但是, 在所有国家里, 国有经济的改革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

在倡导私有化最积极, 私有化之风兴起最早的英国, 历时 10 年方将其占国民经济不到 15% 的国有经济降到 5%; 日本从 1985 年、1987 年开始国铁、NTT (日本电话公社) 等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至今仍未完成。尽管政府希望把国铁的全部股票卖给国民, 但是, 至今仍有 2/3 的股票未卖出, 滞留在政府手中。从国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 《官办企业问题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和政治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7 页。王金存主编: 《世界国有企业》, 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5 页。

铁分解后成立的 6 个公司：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西日本旅客铁道公司、东海旅客铁道公司、北海道旅客铁道公司、四国旅客铁道公司、九州旅客铁道公司的经营情况看，前三家是盈利的，后三家则仍然亏本。国铁改革 10 年，已有亏空（约 25 兆日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现约 27 兆）。^① 据日本运输省预测，国铁清算团所承担的国铁债务须支付到 2060 年前后，方能全部结束。

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国有企业的无效率已为人所共知，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宣布了一些处置国有企业产权和改进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公司业绩的计划，但是，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进展相当缓慢，“发展中国家，不包括转轨国家，正在以平均每年 3 个企业的速度转变，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拥有数百个公司。……尽管出售了一些非常大的公司，但发展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份额自 1980 年以来一直顽强地维持在一个高水平上，大约是 GDP 的 11%，...”^③

在前苏联和东欧等转轨国家，尽管在经历了政治上的巨变之

引自 1997 年 11 月笔者与日本一桥大学中村正则教授座谈的笔记

《现行の约定に基づく国铁长期债务の偿还等の见通し》（日）运输省铁道局：《国铁长期债务问题について（参考资料）》（平成 9 年 11 月），第 14 页。平成 9 年为 1997 年。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官办企业问题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和政治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该报告指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吸收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可以更好地被用于基础的社会服务。在坦桑尼亚，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津贴等于中央政府花费于教育的 72% 和花费于卫生的 150%。

• 国有企业常常获得不相称的信贷份额，从而挤占了私营部门的信贷在孟加拉国，尽管国有企业产出量少于 GDP 的 3%，但其却占有大约 1/5 的国内信贷。

• 国有工厂常常比私有工厂污染更严重。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就同规模、同厂龄的从事同样活动的企业而言，政府的工厂单位产出排放的水污染物是私人企业的 5 倍以上。

• 一种实实在在的国有企业效率方面的改进，将实质上减少财政赤字，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消除财政赤字在埃及、秘鲁、塞内加尔和土耳其，国有企业运行成本只要有 5% 的减少就可以减少财政赤字的 1/3。”

后，已经明确地把私有化作为其体制转轨的必要前提。但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只是在小型工商企业取得较大进展，而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仍基本上是国有。所谓“大私有化”，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着许多困难。这些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仍然是一个步履艰难的过程。

在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历时近 20 年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农村经济体制从人民公社经营体制向农户承包经营体制的转变；社会经济结构从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三资企业、民营及个体经济并存的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向主要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参数调控的市场经济运行管理方式的转化；等等，然而，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的国有经济改革，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已历 10 余年，但却始终进展不大。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面对后起的但却发展迅速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其他经济成分以及外国公司咄咄逼人的竞争攻势，处境困难，步履维艰。以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激活利益机制，促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的改革措施不权未能根本解决国有企业固有的经营效益低下的问题，而体制转轨导致的某种制度真空状态所引发的代理人机会主义倾向上升，败德行为泛滥，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成为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与此同时，以惊人速度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却迅速地抽掉了传统体制的运行基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性演变导致了国民经济双高负债局面——国家通过银行对居民的高负债、国有企业对银行的高负债——的产生，它使整个国民经济面临潜伏着极大的信用风险，是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高速高效增长的最大隐忧。国有经济配置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改组因此成为历史的必然。

1997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加快国有经济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的优化配置是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之一。它从理论与政策层面都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二节 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 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在现实的各种类型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都是一个客观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隐含着如下判断：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现有的经济学，将会遗憾地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至今为止，东西方两大经济理论体系对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等相关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充分的解释。

在西方经济学中，主流思潮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和对国有经济的否定。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理论倾向，与其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具有重大关系。^①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也是现代经济学创立的 18 世纪以及此前的 17 世纪，是自然法哲学学派和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思想在欧洲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中心地位，广泛影响当时各个社会学科发展的时代。当此之时，A·斯密（Adam Smith）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接受了自然法学派、启蒙学派的关于

^① 当然，不否定价值倾向的作用，但是，价值倾向的形成也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社会哲学思想，^①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作为构建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而社会公共利益不过是各个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迭加。实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协调的机制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曾不止一次地以讴歌的口吻谈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动地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相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②与之相类似，英国伦理学家 B·孟德维尔（Benarid Mandeville）则提出了“私恶即公利”说。B·孟德维尔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个巨大的蜂巢，把人比喻成这个蜂巢中的蜜蜂。最初，“蜜蜂们”，即商人、律师、医生、牧师、法官、政治家等都是只为自己考虑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损害别人，因此，蜜蜂们的社会里的一切行业都充满了欺骗。“律师们的艺术是在人们之间制造纠纷”，“医生们轻视病人的生命，只是盯着荣誉和财富”，“商人们在市场上卖假货”。然而，正是损人利己的邪恶导致了对人人有利的后果（公共利益），因为“邪恶培植了聪明与机巧，这就带来了生活的便利。这

事实上，A·斯密本人就是当时欧洲启蒙运动的另一学派“苏格兰道德学派”的主要思想家之一。

^② A·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13～14 页。

是真正的欢乐、舒适与安逸。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也过着火日子。”^①如果说，B·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说是从伦理道德学的角度，那么，A·斯密的“分工交易”说则是从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阐述了市场制度在促使自利的个人实现社会利益上的优越性。“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众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既然市场能够有效地协调个人之间的利益，促进社会利益，组织的作用就极为有限。国家的作用，仅仅限于国防、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以及为实现上述目的的赋税。在A·斯密的理想社会中，国有经济是没有存在必要的。

以A·马歇尔(Alfred Marshall)、A·A·古尔诺(Antoine Aubustin Cournot)、M·E·L·瓦尔拉斯(Marie Esprit Léon Walras)所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分析至今仍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均衡价格理论分析完全接受了A·斯密关于人的行为假定，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或者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论证了：(1)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是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的，因此，资源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利用；(2)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品价格必然与厂商的平均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② A·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7页。

成本相等，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按最低价格购买商品，即消费者的有限收入可以获得最大的消费满足；（3）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无论厂商从事哪个行业的生产，他可以获得的边际收益必然等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都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因此，既无厂商进入，也无厂商退出，资源流动达到了均衡状态，这也就是说，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3）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社会资源的利用是最节约的。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完全竞争市场中，组织是没有存身的余地的。尽管在论述生产要素构成时，A·马歇尔在传统的三要素基础上引入了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能力作为第四个生产要素，但是，正如 R·H·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所指出的：既然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通过价格体系发挥作用的竞争，可以做所有协调工作所必需做的事情。而我们又有管理这个生产要素，它的功能也是协调。如果定价体系提供了协调所需的全部功能，为什么还需要管理呢？”^①新古典经济学连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企业为什么存在都难以解释，也就更无法说明国有经济的存在了。

A·马歇尔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根据现实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大量垄断现象，提出了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理论。J·V·罗宾逊（Joan Violet Robinson）从批判传统的各种“完全竞争”的假定出发，然后列举了许多事实如差别价格（price discrimination）、买方垄断（monopsony）的存在等，论证“完全的”竞争不可能存在，建立了她的不完全竞争理论，E·H·张伯伦（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产品差异（product differentiation）、销售成本（selling costs）入手，否定了市场上具有同一价格的“一致的”（homogeneous）商品的存在，指出：在传统的供求均衡理论中，需求代表消费者的欲望满足程度，供给只代表生产的成本，而引入销售成本概念之后，生

R·H·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54 页。

产者的供给曲线依旧，但是，由广告所增加的需求既扩大了原来的需求量却又计算在供给曲线内，说明在存在销售成本条件下，经济中存在着一个与生产成本无关，也不是来自价格、技术、消费嗜好变化的需求，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完全（纯粹）竞争价格理论。

E·H·张伯伦、J·V·罗宾逊通过修改、否定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模型的前提，指出现实中的市场经济由于垄断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将偏离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状态，也即存在着市场失灵。E·H·张伯伦、J·V·罗宾逊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理论分析，虽然在实质上已经指出了在市场经济中引入组织的必要性，然而，萦绕着他们“完全竞争市场情结”却使他们只是对 A·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从前提、内容、结论上作了较大修正和补充，但却没有脱离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基础。垄断因素的引入，只是为了使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更为接近现实中的市场运行状况，然而，在对市场的价值判断上，E·H·张伯伦、J·V·罗宾逊与 A·马歇尔等是相同的，都承认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垄断竞争理论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为了研究如何使现实中的垄断竞争市场变为完全竞争市场。因此，这个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垄断竞争革命”的理论与稍后的同样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样，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然而，由于在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方面，仍然与 A·斯密是一致的，^①因而，在市场与组织关系的理论分析上，不可能跳出斯密的窠臼，至于把国有经济纳入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与以分析，也就更不可能了。

J·M·凯恩斯之后的西方经济思潮，在对市场与组织作为社

正因为 J·M·凯恩斯没有为他的理论建立新的行为假定，因此，30年后，以 J·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批评凯恩斯学派方法论上的二元论，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人的经济选择时遵循了经济人假定，然而，在分析人的社会或政治选择时却是按照另一种行为假定进行的。从理论逻辑的一致性要求来看，J·M·布坎南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会经济运行方式的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回到斯密去”的观点一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从 F·A·V·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M·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到 R·E·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T·J·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N·华莱士(N. Wallace)为代表的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学派到 J·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尽管他们的经济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方面，坚定地坚持 A·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其共同的鲜明特征。因此，在市场与组织关系的理论探讨上，始终不可能比 A·斯密更进一步，至于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就更无法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了。

纵观自 A·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思想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 200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内容、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其出发点基本上不变，因而，“完全竞争市场”也就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一直萦绕于怀，挥之不去的情结。多少年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似乎从未认真反省作为其研究前提的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否合理，市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执其一端，一直不倦地埋头探讨如何创造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企望在现实经济中能够出现完全竞争市场。因而，也就一直无法在其理论体系中很好地说明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了。

与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潮相反，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在理论上表现了对市场的强烈否定和对组织从而对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经济的极大推崇，形成了另一个极端。

如果说 17 世纪、18 世纪的自然法哲学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分析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的强烈否定与对计划经济以及国有的推崇，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作为对千百年来私有制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弊病，建立一个在财产公有基础上的有组织的理想社会，实现人类大同，可以说一直是人类最优秀分子的崇高理想。远的不说，文艺复兴时期，T·莫尔(Thomas More)、T·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以及F·培根(Francis Bacon)就在《乌托邦》、《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著作中阐述过这样的理想社会。在那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不劳而获者，没有争斗及违法行为，所有的人基于对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理想以及对实现它的制度安排的一致意见，实现了社会生活的高度和谐和自我管理。在这些著作中，我们无例外地看到了对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类利己行为的强烈抨击和对建立在公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具有一致社会目标的人们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的推崇。

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市场经济还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T·莫尔、T·康帕内拉、F·培根对组织经济这种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推崇主要还是和对不同财产制度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那么，诞生于19世纪初的以R·欧文(Robert Owen)、圣西门(Saint-Simon)和C·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由于目睹资产阶级大革命并没有带来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天国，而只是带来了“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那里，“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

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惟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妒忌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①因而，他们把批判的矛头不仅对准私有制而且对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R·欧文批判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它制造竞争和敌视，妒忌和不和，奢侈和贫困，专制和奴役；它“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它在理论上既不符合正义，在实践上也不符合理性。^②C·傅立叶则对A·斯密所讴歌“看不见的手”将引导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实现社会利益予以尖锐的讽刺：“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要求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在文明制度的体系中，每一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斗争的状态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高度对立使“文明制度结构是个人反对大众的普遍战争。”^③只不过“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使他们不仅对私有制而且对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持彻底否定态度，因而，在他们构想理想社会时，都否认了任何自发的社会秩序可以实现他们的理想，选择了组织经济并把财产的社会公有作为它必备的基础。在圣西门构想的“工业社会”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真正的合作者和伙伴，他们结成一种具有完全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7～408页。黑体字是原有的。

《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14页。

《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8、223页。

新型人际关系的组织——联合体。联合体成员建立在对组织目标高度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自由、自由生产，使该社会成为一个以生产货物为中心的有组织的大工场，因而，在以往社会中对人的政治统治将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政治将成为关于生产的科学或者完全为经济所包容。

用组织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其有效运行建立在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的认同或者说组织成员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距维持在足够小范围内。空想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承认“人生来就具有谋求幸福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他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因，是终生都有的；用一般人的话来说，这便是人的利己心。”但是，又认为“环境对于人的本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①因此，为了实现组织的有效运转，圣西门强调教育的作用，认为必须有一个“新基督教”，通过一批新式的传教士宣传新社会的价值观念，反对利己主义哲学。而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设计了详尽无遗的监察制度以反对任何对组织的离心倾向。

在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不公正，公有制和国有经济以及社会正义联系起来。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他们不仅重视人的基本行为假定对制度选择作用的分析，而且注意到环境也即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作用，这种观点比起 A·斯密等把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作为制度分析的出发点，显然更切合实际。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抽象的人性、理性与正义观念作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构想未来理想社会的出发点。认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

的”，^①却充分体现了他们理论的空想性质。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使它必然地向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趋势。与此同时，他们也阐述了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趋势；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的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周围，并存着一些小商品生产者。这种自发的、无计划的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后来，“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②由于“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③但是，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只是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生产的统治方式而已。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决定了，“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④这种不相容性表现为组织与市场的对抗：“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⑤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页。

同上书，第427页。黑体字是原有的。

同上书，第427页。

^{①⑤} 同上书，第428、431页。黑体字是原有的。

的直接对立面：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①在竞争的压力之下，市场不断地让位给组织，“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②在社会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③最后，作为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激化的内在矛盾的惟一出路必然是：“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④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⑤“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⑥从上面所摘引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市场经济，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在摧毁封建领主经济，促进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的历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市场经济的作用，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取代之后，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分析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

^⑤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0、435、435、437、441页。

^⑥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的社会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即它是一个完全取消了市场的组织经济，一个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和产品经济内在统一的整体。与之相适应的是完全摆脱了旧观念束缚的社会主义新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细节的描绘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由生活在未来社会中的人解决的问题。^①但是，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显然是难以容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身又将为计划经济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内在联系的分析，理论逻辑十分严密，这使他们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蓝图对后来的实践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十月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现实性从未产生过怀疑，而在获得政权之后，则力图将之付诸实施。但是，在任何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那种完全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与计划产品经济都从未实现过。至多只是建立了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占优势地位的运用指令性计划控制社会经济运行主要部分的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和市场交换关系从未被计划完全取代过，甚至，这种计划经济只有在较客观地承认和利用市场关系时，才能取得较好的运行效果。而越是力图完全地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构想的，效果反而越是不好。应当说，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社会蓝图不符合革命后的各国社会经济现实固然要负部分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却应由后来的实践者来负。因为，这种原有理论结论与实际社会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1页。

经济情况的不相吻合，本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绝好机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包括斯大林在内（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他为首、由他倡导的）一大批经济学家逐渐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作茧自缚式的僵化态度，在理论研究中采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的著作顶礼膜拜、寻章摘句，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的个别结论、论断不问其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及其发展，盲目迷信、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这种貌似坚持，然而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的作法，却使这一现实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论反思。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对市场与组织、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不但基本上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视野。相反地，在相当程度上把理论变成了教条。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众多告诫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以及社会成员“必须”遵守、“应当”照办的“客观”规律、原则，要坚决反对的倾向。然而，比应该怎样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造成了这样却受到了忽视。R·H·科斯曾不无讽刺地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因为，其中许多“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②而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也出现了突破传统理论框架，把市场交换关系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以及探讨公有制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性的研究，如以兰格、布鲁斯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我国自 70 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探讨。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这里的分析没有包括它们。

^② R·H·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52 页。